

試論邊緣地區的農業商業化

陳志讓

- 一、人口的增減
- 二、涪陵農業
- 三、農業商業化
- 四、收入與負稅
- 五、社會變遷
- 六、文化
- 七、結論

華中邊緣地區農業的商業化是清末民初時期一個重要的變化——整個區域的收入增加，負稅能力增加，人口也增加；整個區域於是變成了政權分散情形下各種武裝勢力爭奪的對象。我所謂的華中邊緣地區包括秦嶺以南，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一帶，漢水上游至老河口、渠江以東，烏江以東，和澧水、酉水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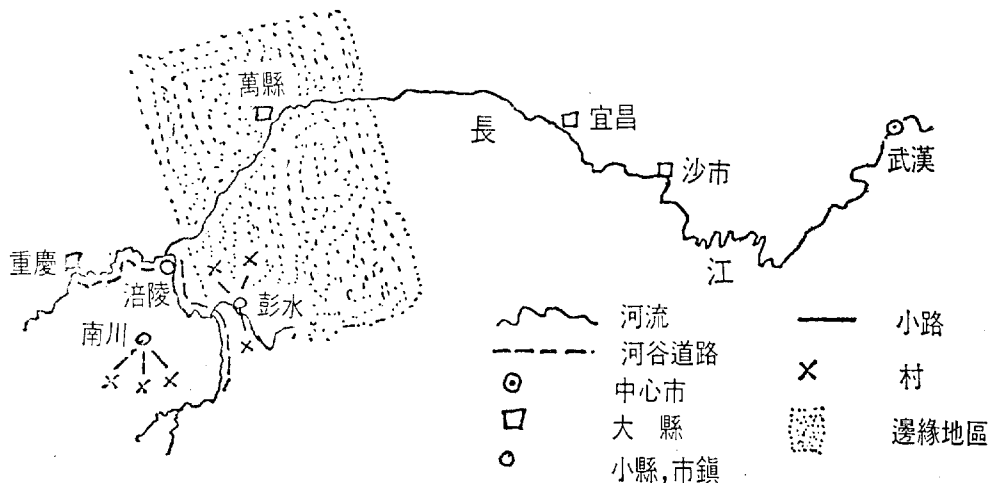
本文的主題就是這一個巨變的輪廓。研究分析之中，主要的困難在於資料。清末民初正是地方志編纂刊行停頓時期；已刊行的，仍然墨守成規，頌揚鄉賢節烈，很少注意到地方社會的變遷。^①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受了新史學和新社會經濟理論的影響，關於社會變遷的材料才多了起來，同時文化因素對社會經濟變化所起的作用卻又忽略了。

西方學者對邊緣中心作了系統分析的第一位是斯丹福大學社會學教授 G. W. Skinner。在他編著的帝制末期中國的城市一書中，他討論了「十九世紀中國區域的城市化」，^②將中國分為八個大區，每區之中有邊緣、中心地區之分。分別主要在人口的疏密，灌溉系統的廣狹，種植收穫的頻度，地區與職業的分工，貿易系統，技術條件，和其它因素。這樣形成了行政與經濟的區域體系，從中心到邊緣也就是

^① 周開慶，民國新修四川縣志叢談（臺北，1964）。其中轉載了1929、1931、1964各年地方志編修的規定。

^② G.W.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1977), pp. 275-351.

從重要到次要，從高級到較低級，從較深的城市化到較淺的城市化。如以四川東南部爲例，情形是這樣的：



那一本書中也討論城鄉文化的差異，分別了儒佛道城市的大傳統和通俗化的鄉紳農民的小傳統。這裏又暗示有高低層次的分別。^③

最近Skinner的理論受到了B. Sands 和 R. H. Myers的批評，要點在於這個理論用事實來測驗，有不少的問題。^④我選用 Skinner 的長江中上游兩大區中一個小區——川東和下川東，也在測驗他的理論是否合乎事實。這個小區屬於我近來研究的華中山地的一部份。那裏從甲午戰爭以後到七七抗戰以前經過一段急遽的農業商業化，和政治社會的變遷，變化的形態又與邊緣地區的文化有密切的關係。這樣的研究也許對那四十年間中國歷史的了解有些幫助，同時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家指正。

一、人口的增減

這十縣人口平均密度爲105.9人，遠低於川西平原成都周圍十二縣的476.5人，也低於川東巴縣附近十縣的317人。中國近現代統計資料的可靠性很有限，邊緣地區尤其零碎。就我個人管見所及，得到的印象是：十七、八世紀美洲農作物在中國的傳播，邊緣地區能利用的資源增加，養活人的能力增加，引起平原人口向山區移動。於是爭端四起，社會情形很不安定，必須從湖北、江西調兵駐守，鎮壓川東。八卦教之亂在1810年代平定之後，從四川中心地區，從陝南、鄂西向大巴山森林地

③ *Ibid.*, pp. 261-67, 475-98。

④ B. Sands and R. H. Myers, "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IV, No. 4 (1987), pp. 721-43.

縣	1890前	1890年代	1910年代	1936	1930年每方里 人口密度
鄧都	82, 155	88, 455		525, 323	189.00
奉節	118, 854	180, 310		356, 541	80.54
涪陵	541, 898		612, 522	1, 041, 688	88.33
南川	149, 562*		181, 722*	396, 637	99.19
黔江		94, 308		115, 461	20.20
萬縣	101, 696			811, 465	221.30
秀山	93, 440	284, 379		314, 112	48.67
雲陽	102, 637		456, 279	509, 317	151.17
(參照川北的情形)					
廣元	92, 288			164, 842	94.55
通江	86, 296			223, 092	46.81
昭化	64, 221			106, 842	113.75

*此外有較高的估計，這裏不予考慮。

資料來源：各縣志；張肖梅，1938，第一章，A1-14，第二章，B3-4。

帶移民又增加。

那以後川東邊緣地區人口的增加，我看不出跟太平天國的動亂的關係。鄧都縣的記載，那裏的人口：1816 爲 106,025，1868 爲 82,155，1893 爲 88,455；萬縣記載的人口：1816 爲 137,878，1858 爲 101,696。太平天國以後，這個邊緣地區人口增加的短期原因可能有 1931 長江大水，和 1935 到 1936 川東中心區的大旱災。但我還沒有找到可靠的資料來證明。同時連年內戰，尤其是 1932 後川北的共軍，又可能引起人口減少。據不完全的統計，那裏的人口確減少了。^⑤

但從甲午戰爭以來的總趨勢是邊緣地區人口在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還超過全省人口增加的速度。全省人口1908年估計爲四千五百萬，1936爲五千萬，而川東十縣從1890前的一百二十萬，增至1936的四百零七萬；涪陵、南川、雲陽從1910年代的一百二十五萬增至1936的一百九十五萬。我以為這樣的人口急遽增加，除了邊緣地區流行疾病較少之外，得歸之於農業的商業化，也就是桐油、豬鬃、草藥等國際市場的擴大和鴉片的國內市場的擴大。全世界農業社會在近代的變遷都與農業的商業化有密切的關係。川東（和川北）並非例外。

⑤ 張肖梅，四川經濟參考資料（上海，1938），頁B26-27。

二、涪陵農業

讓我們看看涪陵。位於氣候溫和的地區，那裏的溫度在冬季很少會降到零度以下，雨量適中，旱季正好在夏末秋初。那裏的重要農作物有：

水稻，收一季中稻，三、四月下種插秧，八、九月收割，可能在種稻之前收一季油菜。冬天放水，稱「冬水田」。

旱地作物：玉蜀黍，四月下種，七、八月收割；

 鴉片，種植時期同玉蜀黍；

 小麥，九、十月下種，次年四、五月收割。⑥

肥料，以動物肥爲主，加入糞，九、十月燒山的灰，綠肥，與油餅。

荒地，植樹以供用材、柴炭，輸出木材，和植桐以取桐油。涪陵以東，沿長江遍山植桐，產量及川桐產量之半。長壽以西桐林漸漸稀薄。⑦

一般說來，邊緣地區天災較少。灌溉系統普及地區如秀山，旱災鮮見，氣候潮濕，害蟲就不很嚴重。流行病絕無僅有。例如涪陵在1933到1936之間有過大旱，那不但是空前的事，而且不如嘉陵江與南江之間的旱災那樣嚴重。⑧

涪陵土地利用情形（1934到1935）：

 鴉片 1,776,601畝，佔耕地面積25%。

 玉蜀黍 1,412,602畝，佔20%。

 薯類作物 1,341,402畝，佔19%。

 水稻 1,200,201畝，佔17%。

 小麥 777,672畝，佔11%。

 其它食物 565,574畝，佔8%。

 共計 6,296,380畝。

 林地約佔全縣面積的20%。⑨

涪陵有三種主要商業性農產品，一是鴉片，二是桐油，三是豬鬃。鴉片的種植大概開始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到1890年代四川普遍種植鴉片，1910年代傳到川東。

⑥ 同上，頁016-19；東方雜誌，卷32，號14，頁116；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土產改進委員會月刊，卷1，期4 鄭望谷的文章。

⑦ 見鄭望谷的文章；鄭勳儉，四川新地誌（上海，1941），頁343。

⑧ 涪陵縣續修涪州志（1928），卷24，頁5-6；四川月報，卷10，期4，四川旱災特輯。

⑨ 呂平登，四川農村經濟（上海，1936），頁119，與前引鄭望谷的文章。

以後鴉片種植大發展，跟軍事當局的政策有關。先是1910年代的滇軍，接著是1920年代的黔軍，再接著是川軍防區當局的鼓勵，直到抗戰前夕。1929到1933鴉片價格極高，種植與產量達到最高峯。到1934與1935，禁煙認真實行，產量才略為減少。但到抗戰開始後，鴉片的生產又增加了。^⑩

桐油出口清代沒有記載，也許不甚重要。據海關十年報告第五次，卷一（1922-1931），重慶在1920僅出口桐油六萬四千擔，到1930突增至482,371擔。萬縣是四川桐油主要出口埠，1922-1931間，保持每年出口230,000擔以上。從清末開始，桐油在民國時期變為主要出口貨。同時價格從每百斤三、四兩增漲到四十二兩；抗戰時期漢口失守，常德市場停業，桐油出口於是大減。1940年實行桐油的政府統制，定價為一千八百元一公擔，還不及生產成本。又因為糧價上漲，農民不再撿桐子，砍了桐樹，改種糧食。到香港為日本人佔領之後，桐油不能出口，這一種重要的出口貨就在國際市場上消逝了。^⑪

四川的白鬃、黑鬃品質優良，以川東南生產者最佳。自1917年以來，中國的豬鬃代替了俄國、芬蘭、波蘭的豬鬃，在國際市場上銷路很廣。據海關十年報告第三與第四次，中國豬鬃的出口：

1902	37,547擔	值2,439,148海關兩
1912	47,105	3,502,819
1921	44,105	4,219,478

其中四川豬鬃約佔五百萬元。

三、農業商業化

邊緣地區多為山區，經濟自足的程度遠遜於中心地區，不可避免地要跟中心地區發生交易關係。邊緣地區的經濟不是從手到口的自然經濟，但這不就是說平原地區的經濟是自然經濟。邊緣、中心的交易關係得看產品的供求、交通的情況、市場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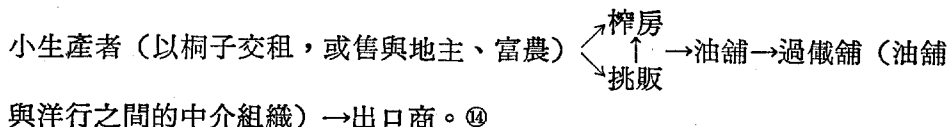
邊緣地區也有 Skinner 所謂的三級市場。中心市場，即躉售市場多在邊緣的邊緣或中心地區；中級市場即躉售兼零售；標準市場即零售市場。與此平行的有金融

^⑩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1957），頁13；中國經濟，卷1，期1，頁13；時報，民國8年1月11日，民國8年9月17日；張肖梅，四川經濟參考資料，頁C138；四川文獻，卷5，期156，頁3-4。

^⑪ 呂平登，四川農村經濟，頁296；王成敬，四川東南山地區之經濟地理與經濟建設（重慶，1944），頁16；四川省經濟季刊，卷1，期3，頁445。

結構——地方銀行的分行或辦事處、錢莊票號、私人借貸。^⑫以涪陵為例，一共有
一百一十九個各級市場，其中有八、九個中級市場和一個中心市場。像西陽的龔
灘、酆都的高家鎮，是很少見的大市場。較大的市場多在河流沿岸。即使河不通
航，河谷兩岸常有小路連接中心和標準市場。^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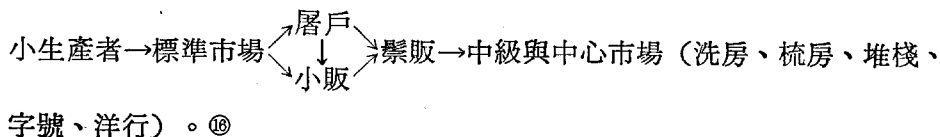
市場的結構先以桐油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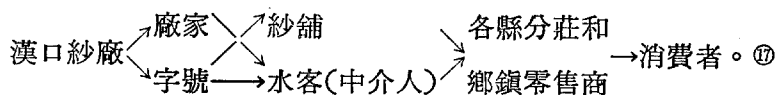
桐子每五十斤榨油十斤，榨房收一斤或七角五分錢作為榨油費。油餅、油粕售
與小生產者作為肥料。挑販、油舖都有「幫」，形成壟斷局面以取利。過儀舖每擔
從油舖收一角，從出口商收二角手續費。

涪陵是一個重要的桐油市場，所售者本地桐油不過十分之一，來自龔灘者十分
之二，來自黔江者十分之七。^⑮重慶和萬縣是大市場，但提煉則在漢口，從那裏輸
出國外。

與此相似的有豬鬃市場結構：



和運銷棉紗的市場：



三者都是在傳統的市場結構上加一級中心市場，與全國和國外市場結構連接起來。
金融結構與此也相似。傳統的票號，在民國初年崩潰，錢莊則大為發展。1914年全
川有一百六十七家錢莊，只有二十一在邊緣地區。^⑱1912到1937之間營業比較穩

^⑫ G. W.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IV, No. 1 & 2 (1964-65); 並參考 M. R. Solomon, "The Market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XLII, No. 3 (1948).

^⑬ 王成敬，四川東南山地區經濟地理與經濟建設，表17；四川月報，卷7，期5，頁178-81。

^⑭ 張肖梅，四川經濟參考資料，頁T18；四川月報，卷8，期3，頁16，24。

^⑮ 陳延炯，萬縣經濟調查（日譯本，東京，1935），頁20-1。

^⑯ 史道源，四川省之豬鬃（重慶，1945），頁18-21。

^⑰ 神田正雄，四川省綜覽（東京，1936），頁447-49。

^⑱ 農商統計表，Ⅲ，頁388-89。

健的有十八家新式銀行，其中與邊緣地區有密切關係的是中國銀行、農民銀行、四川銀行、川鹽銀行、聚興誠銀行。^{①⑨}川北（廣元、閬中、巴中、通江）設有這些銀行的辦事處；^{②⑩}川東（雲陽、奉節）有分行；^{③⑪}涪陵有四家分行，萬縣有九家。^{④⑫}

金融和市場結構，使邊緣經濟與中心經濟，甚至國際經濟聯繫起來，生產和貿易因而興盛，同時也更容易受到中心與國際的影響。從清末以來的長期趨勢，到1934和1935發生了嚴重的金融風潮，影響到桐油、豬鬃等貨物的出口。引起風潮的原因，除了川北的國共內戰之外，它如國際經濟蕭條、中匯投機、幣制改革引起的輔幣不足、省公庫濫發公單等，都是中心地區帶給邊緣地區的損失。^{⑤⑬}

即使在極盛時期，桐油、豬鬃的生產仍然用清代傳統的家庭小生產制。1929以後，有四個地方進行過大規模植桐計畫，全都失敗了。^{⑥⑭}生產品的加工，除了榨油剩下的油粕作爲肥料，所以必須在邊緣地區進行之外，煉油、洗鬃、梳鬃全在中心大市場（重慶、漢口）設廠。^{⑦⑮}

四、收入與負稅

從清代地方志上的數字，很難計算出人民的收入、剩餘多少、擔負捐稅的能力

糧食總生產值	20,560,100元
動物產品	2,139,980
雇工（7,281人，每年每人以60元計）	436,860
經濟作物與附產品	
桐油	1,264,000
鴉片	4,200,000
林木	66,900
薪炭	74,400
榨菜	390,000
共計 29,412,240元	
1932人口 986,290 (194,681戶)	
每人平均總生產值	29.8元
每戶平均總生產值	151.1元 ^⑯

①⑨ 四川文獻，卷5，期73，頁3-4；張肖梅，四川經濟參考資料，頁D13。

②⑩ 財政季刊，卷1，頁130。

③⑪ 西南導報，卷2，期4，頁36-7。

④⑫ 張肖梅，四川經濟參考資料，頁D10；陳延炯，萬縣經濟調查，頁4，6。

⑤⑬ 銀行周報，卷19，期26，頁3-4，13-4；四川月報，卷6，期1，頁87，卷8，期5，頁112；經濟雜誌，卷1，期3，頁44。

⑥⑭ 四川月報，卷7，期2。

⑦⑮ 神田正雄，四川省綜覽，頁556。

⑧⑯ 經濟研究，卷1，期7，頁32-6；陳延炯，萬縣經濟調查，頁2-3；又見前引鄭望谷的文章。

多大。但從民國時代的數字也許可以粗略地算出二十世紀初的情形。我們先看1933到1934涪陵每人或每戶（一戶五口）的收入（見前頁）：

以上的估計顯然偏低，因為運輸、建築、成衣等工資，以及本地消費的經濟作物均未包括在內。

假定在 1900 年代一切其它的總生產值（以 1933 的元為單位）大體相似，除去桐油與鴉片，總生產值約為 23,948,240 元。這顯然太高，因為那時涪陵人口為 612,522 人，只及 1932 的 62%。如果一切總生產值都以 62% 來計算，應為 14,872,728 元，那又太低。如果我們大膽地假定，可以接受的涪陵總生產值在 1900 年代在二千萬元左右，每人的收入約為三十二元七角。那時人口較少，每人的收入應比 1932 年高一些。高多少那只能猜測。

農業月刊二卷四期或農村經濟二卷九期估計每個自耕農在 1930 年代的四川每年負稅五十三元。這個數字顯然太高。根據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土產改進委員會月刊一卷四期（1934 年 10 月）的記載：

涪陵稅收用於縣外者	1,842,198 元
涪陵稅收用於縣內者	1,916,918 元
共計	3,759,116 元

這個數字也值得懷疑，因為那一年全省預算的收入不過 46,931,394 元；同年二十一軍防區的預算收入也是 46,000,000 元，同時省政府估計涪陵稅收（不包括用於縣外的）不過 278,609 元。又應該考慮的是二十一軍防區內 1933 年土地稅至少收了四次。民國時代地方預算數字一般跟實際情形很不相同，我們可以不必重視。據我所見過的資料，上面所引用的土產改進委員會的數字也許是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最可靠的。根據那些數字，1933 年涪陵平均每人交稅三元八角，或每戶交十九元。這跟 1935 年綿陽縣每人負稅三元比較，並不算過高，因為涪陵是一個一等縣。

涪陵稅收的來源：

土地	40.2%
鴉片	20.6
其他商品	14.7
鹽	11.9
其他稅源	12.6⑦

⑦ 根據土產改進委員會月刊的材料計算。

每人平均收入既爲二十九元八角，每人負稅佔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左右。

現在回顧1900年代的情形。以一兩銀等於1932年四十七元五角交稅來計算，涪陵的稅收爲：

地丁加火耗與閏年加稅	6,373兩	即	302,717.5元
捐輸	40,000		1,900,000
公費	11,000		522,500
契稅	24,400		1,159,000
肉厘	3,500		166,250
酒稅	9,788,600文	即	8,586
油捐	4,375,300文		3,878
			184,205
共計	97,737兩	即	4,642,507.5元
每人每年付稅			7.58元 ^②

在1900年代涪陵每人每年付稅之後，剩餘二十五元一角二分；在1933到1934每人付稅之後，剩餘二十六元。這樣，邊緣地區農業商業化的結果是一般人的收入沒有顯著地提高，只是總生產值增加了，能養活的人口總數增加了，負擔的總稅額增加了。總生產的分配，什麼樣的人得到了農業商業化的利益，那是必須解答的問題。

五、社會變遷

大動亂之後軍人變爲新興的大地主，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一種發展形態，卻非中國特有的形態。太平天國之後，湘淮軍將領佔有土地，成爲近代中國新興的大地主；民國開始以來，四川和別省軍人重演這一種形態。呂平登和別的人都引用僅有的譚儀父的十縣調查，說明了這個現象；^②我在軍紳政權一書中也解釋過這個現象。動亂之中，舊地主的土地所有權需要武力保護；同時軍人又需要官紳的社會聲望和行政能力來幫助他們。新興地主象徵著舊地主的沒落，這是二而一的事。^③

如果說新地主完全不受宗法觀念的束縛，可能引起誤解。他們漠視公田廟產，但並不漠視家人親戚私人關係。公田廟產在他們統治之下商品化了。^④許多當時分析社會經濟問題的人和後來寫社會經濟史的人都注意清末民初土地佔有與地權集中的現象，例如農學月刊二卷四期中就說，在1930年代四川邊緣地區大地主佔有達70

^② 涪陵縣修涪州志，卷6，頁2-3；經徵成案匯編，第一期，甲丁冊，頁2，乙冊，頁7。

^③ 呂平登，四川農村經濟，頁186-91。

^④ 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三輯（北京，1957），頁703。

^⑤ 呂平登，四川農村經濟，頁131。

%的「耕地」。據我 1980 和 1983 在華中山區考察的經驗，這恐怕包括的不只是耕地，也包括林地與荒地。在那個時期林地荒地的生產是很可觀的，是養兵的一個重要財源；他們也在交通的咽喉要地設立收稅點，自己不交稅，將稅負轉嫁給小生產者。

邊緣地區的新興地主是弱小的軍閥和依附他們的官紳。這樣的局面是多年內戰的結果。大體上川東區以重慶為中心，由二十一軍管轄；川西區以成都為中心，由二十四軍管轄；川東北由二十八軍管轄；川西北由二十九軍管轄。在幾個大區之間和邊緣地有獨立性很強的許多小軍閥，這是一個比較穩定但並非和平相處的局面。

邊緣地區，對內對外來說，都是易守難攻的地區。南北中心地區的擁重兵的軍事領袖想佔據華中邊緣地區，伸張他們的勢力。那些邊緣地區於是變成南北鬭爭的焦點。在邊緣地區以內也有意在擴張或意在保守的武裝勢力。一面是團練。據馮和法的估計，四川一省就有五十萬之多，這個數字也許太高。他們抵抗的與其說是軍隊，不如說是散兵、逃兵，從中心地區來的膽大包天或是走投無路之徒。又有既反對豪紳地主，又蹂躪鄉民的武裝組織。這樣在邊緣地區，軍、團、匪就很不容易分辨清楚了。他們有時保護，有時蹂躪。他們之所以能在邊緣地區生生活動，主要的原因是邊緣地區的資源收入增加了，能夠提供足夠的剩餘來養活那許多武裝的人。

六、文 化

農民的文化，記載少，研究的人也少。好像農民除了基本生活，馴服或反抗之外，別無其它精神上與感情上的需要似的。如果我們假定邊緣和中心地區的農民，除了現實的考慮之外，還有精神和感情上苦樂的考慮，他們的行動，既受現實的限制，也受心理的鼓勵。我同意 R. J. Herring 和 H. Huizer^③ 的意見，不能把農民的「宿命論」、「農民意識」、「小生產者意識」等當成永世不變的觀念。農民的態度和行動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也在變遷。因為消息傳達慢，意見交換的機會少，變遷比較慢，但並非一成不變。

我覺得分析邊緣地區農民的文化，先要分辨「河谷人民」和「高地人民」。河谷人民居住比較集中，收入比較多，有學校或私塾，跟市場來往比較方便，受中心

^② 鄉村建設季刊，期 1；四川統計月刊，卷 1，期 1，頁 3，4。

^③ R. J. Herring 在 *Peasant Studies*, Vol. VII, No. 1 (Winter, 1978) 上的文章，p. 3；G. Huizer, *Peasant Rebellion in Latin America* (Penguin, 1973), p. 18.

區域的影響比較大。新式的東西，如郵務、電訊、報紙，先從中心地區傳到河谷，然後傳到高地。傳統的中心地區文化也集中在河谷，如廟宇、祠堂，於是儒佛道的影響也集在那裏。那裏的宗法關係比較強，解決爭端的制度安排比較有力，男女關係的禮法比較嚴格，女人比較順服男人（例如包小腳，包辦婚姻），個人的希望與目的比較接近中心地區的人。可以說他們比較「文明」或比較「新式」。也可以說他們城市化的程度比較深。

高地人民，用 E. Le Roy Ladurie 的話來說，「還是獅子，還不是狐狸」。他們距中心地區更遠，交通更不方便，文化生活跟中心地區的差距更大。他們愛個人的自由，很容易在自由受限制時發怒，因此地方志形容這種人強悍、好鬪、喜訟。愛自由的人不大願意接受家長的統治。他們的男女關係和婚姻制度，跟中心地區人民很不相同，因此中心地區的人常說他們「淫亂」。高地的女人沒有紡織的纖維供他們坐在家裏紡織，只能到山林去採摘以補貼家用，因此包小腳很不方便。在山林中和到山林的路上，年輕男女沒有家長的監視，唱情歌、跳舞，作為他們戀愛的前奏。^④這些是愛自由、反抗性比較強的人民。

從中心移居到邊緣的人很少有中心地區所謂的「教養」。多半是兵、行商小販、開荒耕地、逃出法網，或在中心地區走投無路的人。這些人不是「溫良恭儉讓」的君子，而是冒險性比較強，身體結實，愛自由的人。愛自由自在的自由。

邊緣地區的教育不發達，那是意想中事。1936年四川邊緣地區教育的情形是這樣的：

川東	萬縣	2,600人中有一個小學生
	涪陵	7,222人中有一個小學生
	雲陽	3,311人中有一個小學生
	奉節	6,257人中有一個小學生 ^⑤

川北的情形也相近。1905年後開始辦小學、初級師範。^⑥可造之材，送到中心地區去深造，如1905年成都高等學堂二百二十三名學生中，來自邊緣地區十四個縣一共不過十八人。^⑦其中很少數到日本留過學。^⑧深造之後是否回到家鄉工作，我沒有

^④ 梅子，四川情歌（上海，1933），頁11，15，23；民俗周刊，期92，頁41；歌謠周刊，卷2，期31，頁7。

^⑤ 呂平登，四川農村經濟，頁69-72；四川月報，卷9，期2，頁397。

^⑥ 四川教育，卷5，頁9；四川學報，第二、三、四、五、十三冊。

^⑦ 四川學報，冊十九，頁21。

^⑧ 同上，冊九，頁2，4，8。

發現有任何記載。也許大多數留在中心地區了。

邊緣人民當然有他們自己的文化，他們的文化並非全是中心地區的人賜予他們的。他們的「世界」比中心地區人的「世界」小。一位美國的人類學家 G. M. Foster 假定農村社會是一個閉關自守的社會，那裏土地的報酬漸減，總生產量增加有限，而且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只能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於是農民認為人生所需的一切東西，供給是有限的，常常是不够的。一家人的生活改進，別的人一定受苦，對別人是一種威脅。例如母親的時間和耐心有限，經濟能力有限，帶孩子的知識有限，母愛也就有限，引起兄弟姐妹間的嫉妬。又如醫藥營養料有限，健康也有限，於是「發福」、「托福」、「長胖了」是引人羨慕的事。Foster 把這種觀念叫做「福氣有限論」(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³⁹ 這種理論有好些應該修正的地方。「閉關自守」不是一個現實的假定，前面我們分析的山地農業商業化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其次，農民與邊緣地區的農民既有理智，也有原始的衝動。承認福氣有限、守本分、安居樂業，是理智的；嫉妬別人，想打破限制，是感情的衝動。理智與衝動常常是矛盾的。前者使邊緣農民易於吸收中心地區的人生哲學和宗教；後者發展了一些邊緣人民自己的人生哲學、宗教、藝術，發展了消極和積極的抵抗、反對命運的行動。這樣，中心地區的大傳統與邊緣地區的小傳統就有了分別，而且時常會發生衝突。農村社會既然不是閉關自守的社會，邊緣與中心既然有些來往交換，大傳統與小傳統發生了接觸，彼此影響，兩者互相接受學習，也互相修正摒棄。

七、結 論

邊緣與中心的分別是錯綜複雜的，我想只提兩三點來總結以上的討論。

從中心城市到縣鄉鎮，到大村、小村，從中心市場到中級市場，到標準市場，Skinner 把它看成一個連續系統 (continuum)。⁴⁰ 我以為除了行政與經濟的連續系統之外，還應該考慮軍事的與文化的連續系統：中心地區的大防區，邱陵地帶的小防區，山地的武裝割據；中心地區的文教組織、寺院廟宇，和邊緣地區的文教組織、寺院廟宇；中心地區用理智提煉的文化系統和邊緣地區更富於自由獨立的文化系統。

³⁹ G. M. Foster, "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o. 67, (1965), pp. 293-94.

⁴⁰ G. W.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258, 265-67.

Skinner 從中心出發及於邊緣；我以為還應當從邊緣出發及於中心。兩者的不同差異是互相影響，經過多年的思考試驗而形成的。大傳統中有不少小傳統的成份；小傳統中，尤其是河谷文化中，有許多中心文化的成份。這樣形成了 Skinner 所謂的城鄉二重性 (the urban-rural dualism)。^④ 例如邊緣的家庭觀念與中心的家庭觀念有相似之處，也有相異之處。邊緣家長的權威不如中心家長，邊緣女人和兒女享受的自由大於中心女人和兒女。這就影響到兩種人性格的形成，對權威、對性生活看法的差異。在宗教方面，看法也有差異。這些都需要仔細地收集材料，加以分析。

從清末到民國的政治大變革過程中，中心權力分散，邊緣權力增長，形成邊緣武裝力量對抗防區制（或鎮守使制）和對抗中心軍事控制的局面。邊緣的分割，防區的分割，區和省武裝勢力派系的形成，和中心想達到局部和全國統一的企圖，這也是應該深入分析的。

這些變遷，我以為都與邊緣農業的商業化有關。商業化引起邊緣地區收入增加，根據上面的分析，卻對小生產者沒有顯著的裨益。留在邊緣地區的剩餘生產養活了更多的人，但每人每戶的生活水準並沒有提高。新興的大地主吸收了大部份的剩餘生產，用以養兵，用以提高他們的享受。工商業需要發展，但剩餘生產很少用在那方面。另一部份邊緣地區的剩餘生產則流到中心地區，在中心地區加工之後銷售到外國。中心地區的軍紳政權則以稅收方式拿去一部份來養他們的兵，維持和擴張他們的政權，以利潤和稅收吸取了邊緣地區新增加的財富與收入，而邊緣則貧窮落後如故。

^④ *Ibid.*, p. 268.